

韩石山 著

我手写我心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晋)新登字8号

我手写我心

韩石山 著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南内环街31号)

太原彩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印张: 10.5 字数: 250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81032-371-7
1·17 定价: 6.80元

自序

四年前,《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出版后,我曾发誓不再写评论文字了。

倒不是像某人说的,评论是一柄双刃剑,斫向别人,反弹回来会伤着自己;怕作家们责问,你的小说散文写得怎么样,凭什么空口白牙訾议我们。不是的,熟悉我的性格的人知道,我不会那么怯懦。

实在是这个工作阅读量太大,又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应有的雅趣。往常看作品,不管是中国作家的小说,还是外国作家的论著,看到会心处微微一笑,看到不妥处略一蹙额也就过去了。这是很惬意的事。自打搞上评论,阅读就变成了一种重负,总会由不得去思索,去探究,弄得苦不堪言。再说,写文学评论原非我的职志,何必为一点余兴过份地劳心费神,且惹得别人不高兴呢。

然而,写作也如同开店,既已开张且形成“门市”,总会有客人来光顾。虽不卖评论了,总还卖点别的什么,带便的客人也会问上句,尚有旧货否?若是随便问的,也就随便打发了,若是至诚至敬的,一时心软,瞅瞅四外无人,常会忍不住将存留的一点旧货(旧艺)拿出来摆显摆显。此其一。其二是,即便无人问津,有时自家也会技痒难捺,忘记先前的苦恼与誓言,悄悄地练几个招式。如此一来,积习难从根上断除,时戒时犯,等于又重操起这“妾身未分明”的旧业。

只是此番学精了,少写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多写自家对文学艺术的体会,和对某种文学现象的剖析,也就是多写综述性的文章,尽量免却阅读具体作品的烦累。说是这么说,真做起来,其分寸是极难把握的。为编这个集子,将已发表过的文章全翻腾出来,一看就傻了眼。从篇目上看,评论作品的文章一点都不比综述

性的文章少。所幸的是，无论从字数上看还是从份量上看，毕竟还是综述性的文章要多些重些。这也就是编《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时，以具体作品的评论为主，这次则以综述性文章为主的缘由。

我的评论文章，有见识的论者常说是散文式的，也还新颖活泼，言下之意是不太合乎文学评论的章法。论者或许是寓贬于褒，在我，却是窃然心喜。这不等于说我还能自立法度么？一个作家能自立法度，这是多么的不易。再说，谁又规定过某类文章该这样写而不该那样写呢。在中国，文章的分类，实是一笔糊涂帐。可以有多种分法，但不能两种不同的分法相互混淆。比如说，以有韵没韵计，可分为诗与散文两大类。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计，可分为诗、散文、剧本等。小说是兼顾了形式和内容。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书信又是从功用上分的。倘若有人要问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书信与散文在文体上有什么不同，我实在说不出来。一是功用，一是形式，本来就是不风的马牛，硬要拉在一起亲热，谁有这号本事？文章应当随物赋形，哪有固定的模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要叫我们的历史学家说，那叫什么玩艺儿，可凡看过且有相当识见的学者，却莫不赞赏作者章法的高明。

习文这么多年，我抱定一个宗旨，无论何种样式的作品，一概以文章对待，既不以内容迁就形式，也不以形式妨害内容。两者原本是二而一，一而二，很难分得开的。统一云云，实则是对为文之道的隔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仅是一份私愿，绝不敢以此自炫。所以说出来，实在是感到我们的评论文章太不讲究文辞与章法，而我的努力与我的期许也还相距甚远。

这几年除了写小说，写散文，和这种散文式的文学评论外，还写些按文学史上的分类该称作杂文或随笔的文章。大都是应报刊的请托或胁迫，开个专栏，一期一期地连续登载下去。粗略估计，有百篇之多，按说是可以单独出本书的，可这年头报多书少，不是大有名望或广有钱财的，哪家出版社肯给你出这种东西。于是趁

此之便，捎带选了一些与文化或文学有关的编了进来。考虑到分开排版会造成纸张的浪费，干脆立个总题，这便是《不羞不臊侃文化》中的篇什。不全是“捎带”，多少还有点“看咱家这号文章写得怎么样”的意思。同样是为了节省用纸，将一些谈创作，谈文人，评介具体作家与作品的小文章也归拢起来另立总题处置。这一点还要请论及的作家朋友见谅。只有《高长虹与鲁迅的反目》，原想写成一篇正儿八经的翻案文章的，不料积习难改，还是写成了非驴非马的样子。寄给一家刊物，说是发表的，勾改得圈圈点点又退了回来。表面的原因是不合体例，实际的原因怕还是文章的内容不合上峰的口味。于是又改成这个样子给了另一家刊物，能否发表眼下尚不得而知。这次想再改回去，想想，还是免了吧。父母总是心疼可怜的孩子，有这么多遭际，特将它殿后。这也是此书中仅有的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

书中少数篇章虽是应景之作，在我，总是认真地写了改，改了写，不敢掉以轻心。时过境迁，事主未必在意，敝帚千金，自家总要珍惜。收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你就是想让我写得差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这商潮汹涌的当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除了书稿的内容外，大概也是哀怜我曾是山西一所高校的学生吧。责编李衍黔女士是我的学长，由她来处理这部书稿，令我倍感同学情谊的可贵。

韩石山

1993年2月20日于潺湲室

目 录

花木成畦手自栽.....	1
批评的焦虑.....	7
多少楼台烟雨中	13
作家的训练	24
漫谈散文创作	47
自信的行当	55
纵横谁似李健吾	60
直搦血性为文章	67
面对商潮冲击的中国文化	73
不差不错侃文化	78
闲话文人.....	132
创作随感录.....	157
关于小说创作的通信.....	181
我手写我心.....	190
坦诚地面对自己.....	198
略工感慨即名家.....	202
看她锦心绣口.....	215
悠悠桃河悠悠情.....	229
执著与变通.....	240
真情的流淌.....	246
序文小集.....	252
作家与作品评介.....	284
看戏杂感.....	297
高长虹与鲁迅的反目.....	309

花木成畦手自栽

年龄越大，越觉得艺术是世间最难把握的事。

前些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艺术就像一个调皮的姑娘，你向她百般讨好，她对你冷若冰霜，你调侃她，戏谑她，她倒对你温柔备至，百依百顺。后来一家出版社要出本《我最喜欢的比喻》，向我征稿，便将这条写了寄去。当时自认为千虑一得，总算摸透了艺术姑娘的脾气。

现在才知道，这不过是自家的一厢情愿罢了。

艺术姑娘岂止是调皮，简直是乖张，毫无道理可言。连一生写诗上万首，被誉为将世上好诗句写尽了的陆游，晚年骑驴过剑门，面对濛濛细雨，还要疑惑自己“此身合是诗人未”，我这样的庸才还有什么话可说？

细想一下，西方人对艺术的理解，实在比东方人高明。他们早早就将艺术归女神分管，且有九位之多（我们平日青睐的维纳斯仅是其中一位），可见早就知道艺术是女性的，且性情乖张，这个通融不了再试试那个，总有理会的。而我们，没有艺术女神，外貌最像的该是观世音菩萨，据说还是男身女相，他也不管文事。天上的星宿中，只有文曲星司人间的文章兴衰，魁星阁里供奉的那位魁星，面目狰狞如鬼怪，也是男性的。想来要的是公道。殊不知，艺术哪有公道可言！

因此，在和年轻作者交谈时，我常劝他们万不可过分局限自己。写诗的不妨写写小说，写小说的也不妨写写散文，碰到一个题材，适宜写什么就写什么，万不可以为咱是诗人，绝不能让小说污了清白，咱是小说家，可不能让散文坏了手气。说不定你在这方面毫无建树，在别一方面却会名满天下。再扩大一点说，也不必过早

地将写作当作终生的事业，说不定你在行政上或工商上更有才能，当个高级行政官员或厂长经理，而将写作当作业余爱好，不也挺惬意吗？终生从事别的行当，公余或晚年写出好作品的，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我所以这样说，也正是感到艺术这姑娘（哪像个姑娘家！）太乖张了。

人最难认识的是自己。艺术上的成功，取决于心性和志向，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天分和努力。通常人们总认为自己的志向便是自己的擅长，实际上，志向多受时势的影响，而心性又往往为志向所掩蔽，懵懵懂懂，错把负心汉当作痴情郎，及至明白过来，早已此身非是昔时身了。多少英雄好汉，华发满头或死到临头方如梦初醒，感慨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万年深。自诩能统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晚年曾悲哀地说：“少小学诗苦难圆，只恨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因此，人在年轻时，反正前路漫漫修且远，不妨上下左右都去求索试试看。失之南田，得之东亩，芝麻不收谷子收，只要能成就一番事业，何必在乎是小说还是诗歌，是行政还是工商？

艺术，说到底是一种心性。艺术女神虽然乖张，心地却是再好不过。只要你能秉其心性，上下左右不懈地求索，冥冥之中，她总会给以照拂，给以指引。此时你往往不甚了然，反要心生怨尤，恨苍天误我。

仅仅苍天误我也还罢了，还有世人的评判，明明是你终生努力的，人家偏不认帐，你轻轻一点的，人家却说是黄金万两。当然，起作用的还有那钢谁也难以违抗的时势。

这三者加在一起，不知成全了多少人，又不知让多少人死不瞑目。

《管锥编》问世后，钱钟书声名大噪，文人雅士相会，大有“逢人不谈钱钟书，饱读诗书亦枉然”之势。可又有几人知晓钱氏的苦

衷？美国学者胡志德在其所著《钱钟书》一书中说：“钱在 1979 年承认，他一直期望成为一个讽刺小说家，甚于任何别的：中国文学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得以延续。”当然，有《围城》在，钱钟书确实堪称中国第一流的讽刺小说家。可钱氏写此书时年仅 35 岁，仅用了两年时间，此生又仅此一部，70 岁了还说这样的话，你能说他不是终生的遗憾？

钱钟书有部《围城》，尚可聊以自慰，林语堂可就更惨了。林氏自谓，从小到老“对科学始终有兴趣”，上大学时就“立志发明最精最善的中文打字机”，还说如果他到了 50 岁那一年忽然去麻省工学院当学生，也不足为奇。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终于宿愿得偿，花费了他全部外汇储蓄 10 万美元，发明了一架每分钟能打 50 个字的中文打字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架有钮盘的中文打字机，与普通英文打字机差不多大小，能打出 9 万个汉字。只是成本太大，没有厂家愿意制造，后来虽被一家美国公司将样机买下，还是为此倾家荡产，落得一文不名。作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世界笔会副主席，林氏的文名，可说蜚声中外，但谁又知道他此生追求的是当个发明家呢？

沈从文该是幸运的了。一个毛头小伙子拥被蜷缩在北京的家乡会馆里，不期然会有郁达夫这样文名藉藉的大作家登门看望，请吃饭，赠围巾，回去后还写了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鼓励他小兄弟你大胆地往前走，就是偷人抢人也无妨。沈氏既未冻馁而死，也未偷人抢人，而是成了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谁知时乖命蹇，正当中年，反而去从事古代服饰研究，不意又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行当，哪个算是本初的志向，哪个又合乎他的心性？

若光说世人的评价，真能把当事者气得死去又活过来。

郭沫若自恃才高八斗，《女神》起家，一生剧本文章不停于手，诗词歌赋不绝于喉。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无奈中研究甲骨

文，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在他看来，若排个一二三，自然是文学第一，史学次之，考古又次之。可世人不这样看，认为他于文学上业绩平平倒是史学和考古还确有开创之功。李一氓谈及郭氏的学术成就，断言考古第一，史学第二，第三才是文学。起郭氏于地下问之，他能服气？

齐白石是大画家，书法、篆刻和旧体诗也很在行。对他的这四种艺术，世人的排列是绘画、篆刻、书法、诗，可我记得早年看过的一本传记上说，他自己的排列则是，诗最好，书法次之，画又次之，篆刻再次之。事隔多年，或许有误，绘画未排在第一，则是敢断定的。艺事如文事，得失寸心知，是该信世人的臧否还是该信本人的定夺？

郁达夫以小说名世，同时写有大量的散文和旧体诗词。在他，自然是小说最好，散文也还经意为之，诗词因自幼受过严格的训练，信笔写来，纯粹是余兴。可世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诗词最好，散文次之，小说又次之。与他相知甚深的郭沫若就说：“达夫的诗词实在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还好。”

丰子恺是画家、书法家，间或也写写散文，最有名的是散文集《缘缘堂随笔》，若论成就，自然是绘画第一，书法第二，散文第三。可你听郁达夫是怎么说的：“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在他的画笔之上。”

还有李健吾，我在此提出这样一个名字，有人或许会感到惊异，觉得他怎么能跟上面的几位相提并论，实则此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奇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不是都沾点边儿，而是都有煌煌的建树，只是不广为人知罢了。我曾写过一文《纵横谁似李健吾》，为他叫冤。别的不说，仅他那通脱而跳跃的文笔，令多少人倾倒，当代文学名家受其泽惠的，就有林斤澜、冯亦代诸人。他终生致力的是话剧剧本的写作，和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散文和文学评论可谓副业，法国

文学研究更是晚年聊以卒岁的勾当。可现在文艺界仅推崇他的文学评论和法国文学研究,好些文学史著作对他的话剧剧本连提也不提。

这世上还有什么公道可言?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京剧《苏三起解》中那位老解差一句话将世事点透了。

可你能说世人的评价全然不对?

作祟的还是那位乖张的艺术女神。或许这里该用得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历史常常捉弄人,你要走进这个房间,却进了那个房间。

不必责怪世人,茫茫人海,难觅的是知音,理睬总比不理睬强。也不必惊扰过世的人,他们已尽其心力,为社会为后世作出贡献,功过任人去评说。天理昭昭,云雾总会散尽。人间有律条,艺术也绝非不可把握的野狐禅。

艺术既是一种心性,其来有自,违拗不得,只能顺其自然。从事艺术是事业,向往成功,必当竭其弩钝。圆凿方枘,调理其间的恰是那位艺术女神,她自有妥善的安排;当你还懵懂之际,她已引领你进了你该去的房间。只要你真的有那份心性那份竭诚,生死以赴者,她保你功成名就,就是偶尔涉足的领域,她也绝不轻慢,反倒倍加爱怜,即便你只像惠斯勒那样画了几笔。

1877年,旅英的美国唯美主义画家惠斯勒,将自己的油画《夜曲》以200个金币卖出,此举触怒了当时画坛泰斗罗斯金,他说这是“一个花花公子向公众脸上泼了一罐颜色,还向他们索要200个金币”。官司打到法庭,法官自然偏向罗斯金。检查长问惠斯勒:“你花了多点儿功夫把这幅画赶出来的?”

惠斯勒说:“根据我的记忆,差不多用了一天,如果画上的颜色没干,我第二天还有可能又往上面画过几笔。就算两天吧。”

检查长以为抓住把柄,厉声责问:“两天的劳动,你就要200个

金币吗？”

这时惠斯勒说了一句至今仍让所有艺术家深感振奋的话，他从容答道：“不，我是为了一生的学识才要的。”

如果最后那几笔是一举定乾坤的话，毋宁说那几笔就值 200 个金币，因为它更是凝聚了画家一生的学识。

真有才学的艺术家的偶一为之，正是惠斯勒那最后的几笔，即或是被迫涉足某一领域，也还是以他一生的学识作基础的。谁又敢说他们的成功仅是侥幸？

为了理解的方便和全面，对名家在各个艺术领域的成就分个一二三或此优彼劣，原不是坏事。不必一定准确，要的是真诚。该鄙弃的是另一类人，他们的评价未必不准确，但其中包藏着某种难言的心理。他们不过是要说，看哪，此人书法好篆刻却不怎么样，诗词好小说却不怎么样。其神情颇似那位指责别人卖矛又卖盾的古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则何如？”自认为稳操胜券。

但他们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是：不管矛折还是盾破，是一个人的。吹峙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过世的前贤们，安息吧。从政又从文的王安石说得好：“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既是自家栽植且花木成畦，何必管它是春兰还是秋菊，是姹紫还是嫣红？

艺术女神只照拂那些又有心性又勤勉的人。她一点也不乖张。人间有律条，艺术也自有她的法度，谁也难逃。

1991 年 11 月 22 日

批评的焦虑

小说，散文，文学批评，在我所涉猎的三种文学样式中，对它们，我的情感并不完全相同。小说是我的看家本领，至少也是起家的本钱，现在是写得少了些，但从未辍断。散文，是我性情的坦直陈露，算是一笔私房钱。唯独对文学批评，情有别钟，说是偶然涉足不能自拔，倒不如说是主动出击情难自己。

文学批评，现在一般称作文学评论，意思相仿，但我还是偏爱前者而厌弃后者。叫评论，看似公允，却不免给人一种调和的感觉；叫批评，似乎偏激，却更符合这一文体的特质，且显得虎虎有生气。

新时期十年中，小说成就最大，散文近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唯有文学批评，像只死狗，怎么踢怎么打也跑不起来。间或有一两篇好文章，也如同夤夜的流星，遽尔而逝，难以照亮沉沉的夜空。

具体到山西，更惨。几位老资格的评论家，有的改行，有的高就，三两个颇有才华的青年评论家，似乎也心不在焉。只有几位中年人在支撑着这不死不活的局面。此外便是个别连句子也写不通的人在连篇累牍地瞎写，再就是我这样连基本训练也没有的人客串其间。说山西没有文学批评，想来不算是故作惊人之论。

原本还有个《批评家》，批评不批评权且不论，至少这名字起得实在好。当年全国一古脑儿办起的十多家文学评论刊物中，就它得天独厚，起了个这么响亮的名字。如同一面高高飘扬的战旗，令人毛骨悚然，总疑心旗下会有一彪人马披坚执锐呼啸而出。如今是连这旗帜也悄然落下，战场上干干净净，——从未发生过什么战斗。

其它报刊中，偶有评论文字，大多是点缀。仅有《太原日报》的

双塔副刊，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发表评论文章，也还有一定影响。若以批评的效果——引起论战而言，不是我刻薄，只能说是独自舞枪弄棒，聊以自娱自赏而已。

记得《批评家》刚创刊时，我曾对内中的三两个年轻人说过：“要当批评家，必须打几个硬仗。”他们问怎样才能打起来，我说一是参与全国的文艺论战，再是自家看准目标，挑起事端，自然便是一场恶战。他们友好地笑笑，似乎是笑我痴人说梦，信口雌黄，我亦深悔不该自作多情，唆人作恶。

然而，道理却是再明白不过的。只有战斗才能产生战士，绝没有身着戎装，手持枪械，比划个架式就成为战士的可能。外国的不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哪个有名望的批评家不是在论战中确立其地位的？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创造社，就是要与其时已在文坛站稳脚跟的文学研究会诸公抗衡，暗讽鲁迅等人“垄断文坛”，其用意恰似林冲对王伦所言：“须知这山寨不是你家的！”内中尤以成仿吾表现最为骁勇，于1927年率先对鲁迅发起攻击，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文坛的文艺论战。是非姑且不论，这场论战使创造社声名大噪，使成仿吾成为当时最激进的文艺批评家，则是半点不假的。鲁迅将自己这一时期的杂文编集时，取名为《三闲集》，就是因为成仿吾说他“闲暇，闲暇，第三闲暇”。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对成仿吾的评价是：“他的说理文字简练痛快，郭沫若、沈雁冰等固然不是对手，周氏兄弟也畏他三分。成仿吾被人称为‘黑旋风’，不止因为他凶猛，那支笔确是犀利。”

30年代还有一位著名女批评家，名叫苏雪林，也是一位敢捋虎须的角色。她是作家也是学者，28岁就当大学教授，文学批评不过是余兴。郁达夫当时声名藉藉，她在《郁达夫论》中，开篇便写道：“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工于谩骂，作品含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易为读者

所注意。”仅此一句，即可见其笔锋之凌厉。她对郁达夫的作品全持否定态度，对此我们尽可不同意，但却不能不佩服她立论的胆识，和分析的透辟。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从30年代至今，所有关于评价郁达夫作品的文集中，无一例外地收有此文，光我手头就有三种。

这两个都是30年代的批评家，再说一个现今的批评家。

1983年，年仅30岁的女博士龙应台回到台湾任客座副教授，实在看不惯台湾文坛因循苟且的文学批评，从第二年起连续发表书评文章，很快引起轰动，被称为“龙卷风”。批评的头一部书，乃当今台湾文坛巨擘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起首便说：“白先勇的《孽子》是一盘未筛选的金沙，其中有几块闪耀的金子，沙粒却也很多，我先挑大块的石头。”先声夺人，是何等的大手笔。1985年结集出版《龙应台评小说》及散文集《野火集》，一年多的时间内，《评小说》印行17版，《野火集》印行100版。两年客座教授期满，又飘然离去，其赫赫声威，至今仍令台湾文坛咋舌不已。

我们可有这样的批评家？固然有时势的原因，可你能说一点也没有我们自身的责任？

这使我想起多年前《山西日报》上的一次论战。王祥夫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发表后，老艺术家力群先生在《山西日报》上著文批评，我第一个站出来替王祥夫辩护，随后又有两位作家起来反击。一场论战已经展开，尚未触及实质，好戏还在后头，不料很快便草草收场。纵然如此，对一家省报来说，能组织这么一场论战，其见识与气度，还是令人钦佩的。略感遗憾的是，论战的挑起者是一位七旬老翁，而我等其时正年富力强，以强凌弱，未免有失厚道。不过，对力群先生，我始终是敬重的，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艺术家就应有这样的气魄。

除了这次，这么多年，我们可有过一次像样的文艺论战么？
没有，至少我记忆中没有。

没有论战，怎么能造就批评家！

而没有批评家的文坛，必然是寥落的。当然，我们有一批埋头写作的作家，不时有优秀的或平庸的作品发表。作家应甘于寂寞，但文坛要的是热闹，——谁又敢说作品也是寂寞的好？通宵达旦，经年累月地劳作，作品发表后却阒无声息，“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是何等凄凉，何等悲壮的景象。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也开过好多次作家作品讨论会吗？

是开过不少。凡是这样的会，邀请我的，我都去参加。捧捧场嘛。只是会上的情形，委实不敢恭维。大都跋前颞后，嗷嗷嗥嗥，颂谀之辞唯恐其少，批评意见半句也嫌太多。最后是美餐一顿，宾主俱欢而散。

最近上海开了个陈村作品讨论会，与会者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评论家蔡翔说，陈村初期作品有可贵的平民意识，后来则显示出一种文化优越感和才子意识。作家王安忆说，陈村近年来常在报刊上发些小短文，实际上是把自已的聪明才智割碎了零卖。同时反问，为什么同样身患顽疾的北京作家史铁生能宁静地超然地面对生活？

我们的那些作品讨论会上，何曾听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

怨谁？

只能怨我们自己，我们造成的这种因循守旧的局面。

先人待我们不薄。山西的文艺批评，原有其悠久的传统。古代有写《诗品》的司空图，有写《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有写《论诗绝句》的元好问，有对文艺识见超卓的傅青主。近世则有写《石头记真谛》的景梅九，写《咀华集》的李健吾，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王瑶，都堪称一代名家。而现今，这优秀的批评传统已消失殆尽，代之而行的平庸的说教，令人厌恶的吹捧。

还有一种倾向，便是对批评的轻蔑。这倒不是山西的特产，可